

· 药物史研究专题 ·

知识、疫病与商业：清代“痧药”运用及商业化

向亚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在日常生活中，“痧药”与“刮痧”“挑痧”等方法共同用于治疗“发痧”。刮、挑等“痧症”外治法在清代以前被广泛使用，药物疗法则在清初郭志邃撰著“痧症”专论时被正式纳入“痧症”的治疗模式。郭志邃自创的治痧方药运用不广，在疫病流行的背景下，“痧症”与疫病界限模糊，医家总结效验“痧药”用于疫病救治，包括防疫功效药品在内的“痧药”被广泛用于慈善施药。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医药市场中包揽药材炮制和成药修合的药铺大量出现，“痧药”供应模式呈现从慈善施送向商品化的转变，促使“痧药”进入日常医疗消费。

关键词：痧药；痧症；疫病救治；商业化

DOI : 10.16307/j.1673-6281.2023.02.005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23)02-0153-09

Knowledge, Epidemics and Commerce: the Applic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Sha-Medicine in the Qing Dynasty

XIANG Yajun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Abstract 】 In daily life, Sha-Medicine was used together with Sha-scraping and Sha-needling to treat Sha-eruption. The external therapies of Sha syndrome such as scraping and needling were widely employed before Qing Dynasty, while relevant drug therapy was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eatment models when Guo Zhisui wrote a monograph on Sha syndrome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 formulas and medicines developed by Guo Zhisui had limited application s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pidemic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ha syndrome and epidemics were blurred, and effective and experienced Sha-medicines were generally consumed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s, as in the charity distribution of free medicin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pharmacies have emerged in the market to undertake herb processing and supply of patent medicines, and thus Sha-medicine was more provided by commercial pharmacies which promoted its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 daily medical consumption.

【 Keywords 】 Sha-Medicine; Sha Syndrom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s; Commercialization

[作者简介] 向亚军 (ORCID: 0000-0002-6743-188X), 博士生, E-mail: xyjkate@163.com

“痧药”即指治痧药物。在现代中医学中,存在单独以“痧药”为名的制剂,用于治疗中暑、中喝等,同时“痧药”亦可作为治疗类似症状的诸种中成药制剂的总称。纪征瀚对于传统时期“痧”及其治法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清代以前“痧”以外治法为主^[1]。据皮国立研究,晚清日常生活中常见发痧急症,“痧药”与“挑痧”术共同用于治疗“痧症”,诸种治痧成药成为夏日救急以及日常防疫的热门商品^[2]。对比两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痧症”治疗模式在清代存在从以外治法为主到内外治法并行的变化,那么“痧症”治疗模式在清代经历了哪些演变?“痧药”如何进入日常医疗消费并得到广泛运用?笔者尝试从“痧”的治疗模式出发,呈现清代治“痧”方式演变之下“痧药”广泛运用的过程。

一、清初的“痧症”与“痧药”

“痧药”作为治痧药物,其运用与清代“痧”作为一个疾病范畴的出现并且所囊括范围逐渐扩大有着密切的联系。“痧症”在清代以前即已存在,纪征瀚对古代“痧症”及其治法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将“痧”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南宋以前以射工、沙虱毒为代表的“沙虫”病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元明时期,文献中开始出现“沙病”记载,对其病因、治法论述趋于丰富,但总体来说“痧症”在明代疾病谱中尚属于一个小病种;第三个阶段为清代,“痧症”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清代中后期甚至发展到“无人不痧,无病不痧”的局面^[1]。

“痧症”范围不断拓展是其在清代的重要特点,其所包含病证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有关“痧症”专论的出现和翻刻^[3-5]。诸种“痧症”医籍中,《痧胀玉衡》为第一部“痧症”专论,该书为郭志邃所作,基本建立了“痧症”的治疗体系,是“痧症”的奠基之作。《痧胀玉衡》初刻于康熙十四年(1675),因“痧之变幻”于康熙十七年(1678)续编。王凯在《痧胀玉衡》基础上简化有关“痧症”的理论讨论,并对“痧症”进行重新分类和整理,写成《痧症全书》,该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刊行,在清代被多次翻刻,其影响力在清代中后期逐渐超越《痧胀玉衡》,成为清代流传范围最广的痧书^[4-5]。清初的《痧胀玉衡》《痧症全书》出现后,“痧症”作为一个疾病范畴基本确立。以下将立足于这两种痧书概述“痧”的病因、治法等。

(一)“痧”之病因

在郭志邃有关“痧症”的论述中,“疫气”及诸种“暑热、秽恶之气”均能导致发痧,并将诸种致痧之气统称为“痧气”^{[6]1,31-35}。王凯基本延续郭志邃对于“痧症”病因的论述,但在其书中增入瘴疠、射工虫毒、解体致病的说法^{[7]10-14}。关于“痧症”的致病机制,郭志邃指出“痧气”由表至里,从肌肤至血肉、肠胃、经络,壅塞于内遂成“痧胀”^{[6]1-2}。“痧气”除由表至里导致“痧症”外,郭志邃亦指出“痧症寒热不由外感,往往毒从鼻吸而入,搏激肌表”^{[6]77}。经过郭志邃、王凯等的整理,清代“痧症”的病因及致病机制基本确定,即由“疫气”“暑热、秽恶之气”所组成的“痧气”,通过由表至里、从鼻吸入两种方式进入体内,进而导致发痧。

(二)治疗方式

清代以前及清初治痧主要用外治法^{[1]86},这在王庭为《痧胀玉衡》所作序言中可以窥见。王庭回忆明末大疫的情形,认为这场疫病为“痧”,“挑之以针,血出,病随手愈”。可见,用外治法开通腠理、排除邪气是治疗痧症的主要方法和机制,并且颇有成效^{[6]4}。

郭志邃《痧胀玉衡》在总结诸种外治法的基础上,将药物治疗法纳入“痧症”治疗体系。郭志邃主张根据“痧气”侵入程度以及“痧症”的轻重采取刮、放、药三法,相比以往采用外治法治疗“痧症”的

医家，郭志邃强调药物疗法的重要性。“痧气”由表至里侵入肌肤、血肉，采用刮、放之法即可痊愈，一旦“痧气”侵入至肠胃、经络，“扶之不起，呼之不应”，刮放之术难于施展，而“仅有刮放之能”的医家也只能听天由命。此时“非药不能救醒”。刮、放之外亦“必用药以济之”，“三法兼备，救生而生全”^{[6]1-2}。在书中郭志邃虽然按照病情轻重主张采用刮、放、药三法，但是“痧气肆行”时，则“不拘表里，传变皆周，当三法兼用”^{[6]2-3}。在“痧症”治疗中，郭志邃除阐释治痧三法外，还主张结合“痧症”数症并发以及发病急的特点治痧。“痧气”所致病症多端，病家在患伤寒、麻疹等时感受“痧气”亦能导致“痧症”，故而痧症常与多种病证相兼而发，“痧症”与杂症相兼而发时，因“痧症”发病急，则倡导先治痧后兼及杂症^{[6]6,10}。

（三）治痧方剂与“痧药”

在郭志邃对“痧症”理论体系的论述中，内外治法并行的“痧症”治疗模式基本确立。郭志邃总结治痧的用药经验，在书中论辨治痧用药的方法和原则，并总结治痧方剂 56 首。王凯在其基础上增加方药，《痧症全书》流传情况复杂，版本众多。纪征瀚比较了张仲馨订本（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晰微补化全书》）《痧症全书》与《痧胀玉衡》所载药方差异，认为除“化毒丹”外，《痧症全书》承继了《痧胀玉衡》的全部方剂，将其中的古方归并到“补遗应用群方”中，又从郭氏治验中总结出 5 首方剂，再另外添加 7 首，凑成痧症 64 方，以《易经》64 卦名方^{[1]86-87}。

郭志邃、王凯等对“痧症”病因、致病机制以及治疗方式进行总结，有关“痧症”病因及治法的理论在清初基本确立，经过痧书的刻印和流传，“痧症”的知识广泛传播，“痧症”治疗模式逐渐推广到日常医疗实践中，同时“痧药”作为治痧药物的指称也开始出现。乾隆十九年（1754）刊刻的刘靖《片刻余闲集》中载，雍正十二年（1754），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的禁山中有匪患出现，时任崇安知县刘靖与建协中营驻防浦城游戎韩之桂等奉命进入山中查勘。时为六月初旬，刘、韩等行至螺狮尾准备出禁山，韩之桂“神气忽昏乱，臂有小红点”，寻到草屋歇脚后，使“饮以痧药，并取磁盘刮其臂，至夜半稍愈，天明渐爽如初”^[8]。根据文献描述，韩之桂夏间在山中行走，感受暑气导致发痧，并致神气昏乱。面对此种情形，众人先让其服用“痧药”，并采用刮痧的方法进行疗救。可见在清初“痧症”医学知识传播的背景下，以服用“痧药”、刮痧等方式治疗“痧症”的医疗模式已经逐渐被民间社会接受，“痧药”与刮放等方法一同运用于救疗突发的“痧症”。

二、嘉道之际疫病流行与“痧药”运用

清嘉道之际，疫病流行。文献中对于此次疫病的记载名目众多，包括“麻脚瘟”“吊脚痧”“霍乱”等。关于这次疫病是传统的霍乱转筋，还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霍乱的新疫病，以及其作为一种新的疾病最早于何时传入等问题，当时以及现代学者研究均存在一定的争议^①。但一般认为，嘉道之际流行的疫病是由印度传入的古典霍乱，自此传入后在中国数次流行，并且在疾病谱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9]。以下将基于嘉道之际刻印的痧书，呈现当时人对此疫病的认识 and 应对。

（一）“痧疫”流行与痧书刻印

据如皋人胡杰记录，“嘉庆庚辰岁九月，如皋痧疫大行”。此次疫病“害人甚速”，“医药稍迟，多不

① 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18 页；单丽：《清代古典霍乱流行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尤其是“第一章方志疾病谱与霍乱年代”，第 17-39 页。

及救”，同时具有数症并发的特点，即疫病初起时“两脚麻木，吐泻交作”，据胡杰观察，疫病之中数症并发，“有呕吐，有吐泻，有单泻，有头痛，有头晕，有遍身冷，有腹痛，有转筋，有寒热，有暗哑，有麻木，有发斑，有咽喉肿痛，有烂喉发斑，有大头颈肿，有昏迷不醒，有烦恼自不知病在何所，有数症兼见，有兼疟痢、风寒、杂症及痘疹者，具数十症，不独麻脚一症也”^{[7]1-2}。

胡杰对嘉道之际如皋所流行疫病的描述与“痧症”的特点具有相似性，即数症并发且发病急速。胡杰等观察到疫病与“痧症”在病因及致病机制上的相似性，在清初痧书刻印、流传以及有关“痧症”治疗模式逐步确立的背景下，时人以治痧的方法应对疫病。据胡杰记载，在疫病流行时，以治痧法先投以“痧药”回春丹、正气散等辛香丸散，“刺委中出血”，之后按症医治，有得救者。由于疫病与“痧症”在病因、致病机制以及治法上的相似性，胡杰总结称“是疫皆痧也”^{[7]1-2}，由此作《痧疫论》综论痧症及疫病，“痧”与疫的界限逐渐混融。

在疫病流行之下，以治痧方法应对疫病，并有成效，胡杰等有感于治痧方法对于应对疫病的有效性，有关“痧症”的专论《痧症全书》却“传世甚少”，因而重新校订并刊印《痧症全书》，于道光三年（1823）刊行。嘉道之际疫病流行范围遍及南北，道光五年（1825）济南茅坛、李廷芳等亦筹金重刻《痧症全书》“以期广为流传”“救灾恤人”^{[10]1-2}。

（二）疫病救治中“痧药”的运用

在嘉道之际疫病流行的背景下，时人观察“痧”与疫病在病因、致病机制上存在相似性，而清初所确立的“治痧三法”在疫病疗救中亦有成效，因而刻印痧书，并在书中进一步总结治痧的方药。

笔者所见光绪二年重刻（道光三年刊刻）及道光五年本《痧症全书》，前者根据何汾增订《痧书》刻印，后者原本由“福建藩属携来”。据纪征瀚考察，何本《痧症全书》的诸多刻印本多由道光二年（1822）福建盐运使司刻本派生而来，道光三年及道光五年本所祖大概为同一版本^[5]。两个版本的痧书在王凯《痧症全书》所载64方外又附“应用群方”，总结治疗“痧症”的方剂。“应用群方”中列方剂20种，包括玉枢丹、牛黄八宝丹、仙方脑麝丸、郁金丸、炼石丹、硫礞丸、润下丸、治噤香圆丸、大羌活汤、加减圣效散、如圣散、失笑散、普济消毒饮、祛瘴辟瘟丹、白虎汤、加味活命饮、六一散、胃苓汤、六和汤、藿香正气散，并附华佗危病方及续附络痛方案^{[7]19-32[10]12-33}。胡杰《痧疫论》中另附“备用诸方”，下列武侯行军散、细荆郁金散、回春丹、透顶清神散、郁金丸、转筋丸、解毒中百散、逐疫郁金汤、花粉丹皮汤、橘贝汤、清火散瘀汤、加味喉痺饮、加减普济消毒饮、驱麻丸、平藿丸、雷示神方^{[7]11-15}。

在疫病流行的背景下，诸多医家对效验成方进行总结和整理，其中，王士雄所列的诸种成方在后世影响极大，并且直接影响“痧药”的运用。王士雄认为“吊脚痧，即霍乱之剧而转筋者，原非另有一证也”^{[11]9}。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中总结霍乱的治法、方药，其中可见“痧症”知识的影响。在“治法篇”中列“伐毛、取嚏、刮法、焮法、刺法、搗洗、熨灸”等外治法，用药上主张辨明寒热，按症施治。同治年间疫病流行背景下，王士雄重订该书时增入“方药第四”，辨明药性，分寒热性质开列方剂、药方，以“拨乱反正”^{[11]88}。王士雄承继以内外治法共同治疗“痧症”的基础上，根据经验、医家著述等开列治痧方剂，如黄芩汤等多种汤剂来源于《伤寒论》，来复丹等成药来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甘露消毒丹为配方及用法来自叶天士，太乙紫金丹（紫金錠）、千金丹（人马平安散）等参考徐大椿《兰台轨范》，紫雪、藿香正气散虽为局方，但是王士雄将其载入时参考《兰台轨范》《张氏医通》等医家著述^{[11]69-88}。

自清初开始“痧症”内外治法并行的医疗模式确立后，郭志邃等医家陆续总结治痧方药。有关于诸种“痧药”的运用情形，其中，郭志邃所开列的成方，据纪征瀚研究多为自创^{[1]86-87}，王士雄对郭氏评价为“用药乖殊”^{[11]12}，从后来者的角度看其所列的治痧方剂也确实运用范围不广。后世医家则不断增入效验成方，尤其是嘉道之际痧书中提及的武侯行军散、平安散、回春丹、塘栖痧药等，以及王士雄等医家

所总结的诸种方药,运用较广,基本确立此后常见“痧药”的种类和范围。

经过医家的不断总结,“痧药”被用于疫病救疗,成为治疫成药的重要组成部分^[12]。用于救疗疾病的“痧药”,其使用方法也展现出“痧症”内、外治法并行治疗的特点。除内服外,“痧药”通常还配合外治法使用,常用“痧药”诸葛行军散、人马平安散搐鼻取嚏。王士雄在“治法篇”载“取嚏”法原理,“霍乱诸痧,皆由正气为邪气所阻,故浊气不能呼出,清气不能吸入,而气乱于中,遂成闭塞之证”“呼出肺主之,肺开窍于鼻”“痧药吹入鼻中取嚏以通气道,则邪气外泄,浊气可出,病自松也”^{[11]19}。除用于疫病救济外,“痧药”亦被用于防疫,其使用倾向于日常化。王士雄在“立效丹”的功效中提及,“暑月入城市,抹少许于鼻孔,可杜绝秽恶诸气”^{[11]71},将“绛雪”佩戴在身上,可避疫气^{[11]74-75}。

行军散、平安散等诸种效验“痧药”被用于疫病的救疗和日常防疫,然而,正如王士雄所提及“治痧之方,用诸多宝贵香灵之品”,加之丸散膏丹等剂型成药需要预先制备,因而效验“痧药”“有力者卒不易得,无力者贵不易购”,遂劝有力者“量力合送”以济世活人^{[11]27-28}。在疫病流行中,“制送丸药”为地方社会疫病救疗的措施之一^[13];同时,由于“痧症”又多发于夏季暑热、秽恶之气蒸腾之时,“夏施痧药”成为地方社会慈善救济活动的内容之一。江都县务本堂旧领于两淮商人,同治五年(1866)由扬州参将朱元松倡立,“堂中善举以施棺、掩骼、义塚、义殓(扛)为重,其余病者送诊施药、饥者施粥、寒者施衣,以及义学、惜字,次第举行”。其中,“施药之法,常年施送观音膏、五蹄膏,夏送痧药,秋送疟痢丸”^[14]。除慈善性质的机构外,个人亦施送“痧药”,如王士雄自己与人合作施送诸种的速效丹、甘露解毒丹等“痧药”^{[11]72}。

三、“痧药”的商业化与日常化

在痧症治疗模式确立以及疫病流行的背景下,诸种效验“痧药”被用于夏日救急及疫病救疗。“痧药”修合所用药料贵重,且丸散等剂型成药修合费时,“痧药”往往以慈善施药的形式施送给百姓。虽然慈善机构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甚至到道光、同治年间后出现了救疗疾疫的医药局,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地方社会提供医药资源的作用,但在疫病流行背景下,社会对于治疫药物存在着一定需求,仅靠慈善施药并不能满足社会对“痧药”的需求。

(一)“痧药”商业化生产

在疫病流行背景下,时人不断总结治疗的效验成方和经验,而有关于“痧药”的具体生产和销售过程则并未明晰,文献中有关“塘栖痧药”的记载或许有助于呈现“痧药”的制备和生产方式。据《清稗类钞》“塘栖姚致和堂痧丸”条,“仁和有塘栖镇,其居民姚氏,自明即设致和堂,以卖痧丸,堂额为董香光书。盖其先世得丸方,能治痧,累代制以施人,国初犹然。其后力不能继,乃始取值,而塘栖姚致和堂痧丸,遂名闻天下,南至闽、粤,北至燕、赵,无不购之。业益盛,举族蒙利”^[15]。徐珂曾在《清稗类钞》中载录“塘栖致和堂”由慈善施药向商业经营的转变过程。

据考察,《清稗类钞》有关塘栖痧药的记载袭自《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俞樾次子娶塘栖姚六吉为妻,日记中记载了光绪壬辰(1892)二月,俞樾路过塘栖时二儿妇姚氏访亲之事,并记述姚致和堂百年创业之过程^{[16]3-4}。俞樾的记述大概源自姚氏自述。光绪《唐棲志》记载“姚致和堂”创业经历,姚氏先祖振麟“得奇药方,治瘴疠霍乱有异效。虽滇黔辽沈,亦闻名而争购之”。除姚玉符的创业之功外,姚湘(1764—1831)“益恢矣其业”,使得“姚氏药闻天下”^[17]。卓介庚根据资料考订姚氏谱系,姚振麟、姚湘之间相差四代^[18]。据此大概推断,姚氏在明末清初开始制备“痧药”,到姚湘经营之时,“姚氏致和堂痧药”已经是远近闻名。俞樾时塘栖一镇“冒其名以牟利者,不可胜数”^{[16]3-4}。

姚氏自述以及地方文献中对于“姚致和堂”所制售“痧药”的影响力可能有一定的夸大,但是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推知,至晚到 19 世纪“姚致和堂”已经开始以商业化的模式进行生产和经营,“姚致和堂痧药”的销量或许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姚氏致和堂”“姚致和堂痧药”的规模化制售是在当时医疗环境和医疗资源供应商业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明末以后,全国跨区域贸易的频繁,全国性和区域性药材市场出现,以往运用于宫廷的“道地”药材,到明中后期及清代在市场中更为容易获得^[19-21];同时,医药市场开放,进入门槛低,从事医药行业和提供医药服务人数增加,加之医药分业渐趋明显,到清代,医家开方、药商卖药的医疗模式确立,药物从采择、流通到炮制、修合均由商人包揽^[20]。清代出现“药肆盛行”^{[22]264}的局面,药物商业供应中出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药行、药铺等分别承担药材流通以及炮制修合等工作。药铺倚赖资本便可以在医药市场中获得修合药物所需的药材、知识以及具备炮制药物技术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商业化生产模式制备诸种药品的药铺得以大量出现。

“姚氏致和堂”根据其先祖所得之“奇药方”制售“痧药”而远近闻名。“姚氏致和堂”的药方可能并非容易获得,但是痧书的广泛刻印和流传,其中所开列的诸种成方,则为城市中的各大药铺制备“痧药”直接提供知识来源,各大药铺所制售的诸种成药中,开始出现“痧药”的分类。杭州张同泰堂在附有嘉庆十年(1813)序的药目告白中言明,其制售的药物有“法制饮片,虔修丸散膏丹,杜煎虎鹿龟驴等胶,四时沙甌花露,各种药酒”外,“并有秘方痧药灵丹”^{[23]11-12}。光绪年间的雷桐君堂、沐树德堂更是在药目文献中直接增加有关“痧药”的分类,分别列有灵宝如意丹、诸葛行军散、痧药蟾酥丸、辟瘟丹、卧龙丹、太乙紫金锭、八宝红灵丹、人马平安散、万应午时茶、太乙丹、九转灵砂丹、雷公急救散、冲天散、飞龙夺命丹 14 种成药,以及卧龙丹、白卧龙丹、开关散、万应痧气蟾酥丸、诸葛行军散、人马平安散、飞龙夺命丹、绛血丹、紫雪丹、碧血丹、三圣丹、太乙玉枢丹、太乙紫金丹、纯阳正气丸、万应午时茶、甘露消毒丹、辟瘟丹、寒霍乱吊脚痧药、太乙救苦丹、霹雳回阳膏、来复丹、白平安散 22 种成药。其中,沐树德堂“痧气门”所列的 22 种成药中,12 种直接来源于王士雄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1]71-77[24]}。

“痧药”多使用辛香药料,对保存条件有一定要求,一般用“瓷瓶紧收”,甚至有“以蜡封之”者,以防止泄气^{[11]72-73}。清末贮装“痧药”的瓷药瓶实现规模化量产^[25]亦反映出“痧药”生产的商业化。《中华医药卫生文物图典·陶瓷卷》中搜集有大量药瓶的图片,从图集中看,部分瓷瓶表面以文字形式标明药铺堂号、药品种类,其中包括诸种“痧药”,如平安散、蟾酥丸、卧龙丹、痧气丹^{[26]266-267,458-459,482-483}、万应痧药^{[26]463}等。这些瓷瓶体积小、重量轻,装药量在 1 ~ 2 钱(1 钱=3.125 g)。以瓷瓶包装的“痧药”,便于日常携带和使用,一定程度上促使“痧药”的流通与消费。

相比于医书中详列“痧药”的配方及功效、服用方法,商业药铺所刊行的药目中省去成药的具体配方和炮制方法,主要对药物的功效进行详细说明。以雷桐君堂“诸葛行军散”为例,药目中载录:“诸葛行军散:治中暑触秽、时邪疫疠、霍乱吐泻、胶肠腹痛、四肢厥冷、自汗脉伏、清阳内闭、浊阴失降、猝然晕倒、不省人事,以及感受山岚烟瘴,宜用清水调服一二分,或吹入鼻孔,其气轻清芳烈,能使诸邪涣散,危疴立愈,有回生起死之功。乃诸痧症之圣剂也。并治痰厥咽喉诸症,又治小儿急慢惊风,兼点时行目疾。舟陆远行,随身佩带,大有裨益。”^{[22]294}药商在药目说明中尽量多地囊括“痧药”的药效,从防疫救急到日常出行备药,以起到对其所制备“痧药”的宣传作用。药商在制备和生产“痧药”的同时,挪用有关“痧”的医学知识说明“痧药”的功效,亦通过“痧药”流通传播甚至重塑有关“痧药”和“痧”的知识。

(二)“痧药”价格及其使用日常化

“痧药”作为治疗疫病的效验成药,其运用范围受到药物价格的影响。药目文献中记载有诸种成药的价格(见表 1)。

表 1 咸丰本与同治本记载叶种德堂“痧药”价格比较

药名	叶种德堂（咸丰）	叶种德堂（同治）
八宝红灵丹		每两五换
卧龙丹	每两一换	每两一换二
诸葛行军散	二十换	二十二换
痧药蟾酥丸	换半	每两换八
辟瘟丹	每两二分	每两二分半

注：数据来源于《叶种德堂丹丸全录（咸丰本）》《叶种德堂丹丸全录（同治本）》，以及牛亚华主编的《栖芬室藏中医典籍精选·第二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

除价格外，药目文献中附有药物使用的说明，据此可以大概估算单次使用的花费。可以看出，药铺制售有不同价格层次的“痧药”，如诸葛行军散“药品贵重，修合不易”^{[23]132}，价格居诸种“痧药”之首，其单次使用的费用为 2 ~ 4 钱，八宝红灵丹单次使用的价格约为 5 分，人马平安散、卧龙丹单次使用所需要的花费在 1 ~ 3 分。

药物消费是家庭的必要支出，将其与家庭消费总支出以及家庭主要消费品价格进行比较，大致可以呈现时人对其的购买能力^{①[27]}。据方行估算，“清末，江南温饱型农民年生活消费总支出 93 296 文钱，如按银一两兑钱 1 600 文折成银，共约为银 58.3 两”^{[28]273}。根据王业键先生整理的数字，1820 到 1880 年代，米价虽有涨落，但其价格大致在每石一两五钱到二两五钱之间浮动，太平天国运动高涨时期，米价上涨到二两五钱以上，价格最高时达四两以上^[29]。江南农户每人每年生活所需粮食为 3.6 石^{[28]261-262}。由此，19 世纪下半叶，江南地区每人每年在粮食上的花费大致为五两四钱到九两，每月花费大致为四钱五分至七钱五分。由此，单次使用的花费在 1 ~ 5 分的“痧药”，在江南一般农民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普通百姓或有能力购买。

“痧药”作为特定药物种类指称的出现及其范围的确立与“痧症”范畴的演变有着直接联系。清初，郭志邃写成第一部“痧症”专论，确立有关“痧”的论治体系，“痧症”作为一种疾病范畴逐渐确立。同时，郭志邃将药物疗法纳入“痧症”治疗模式之中，并系统总结治痧的方药，“痧药”作为治痧药物的指称开始出现。在疫病流行的背景下，由于“痧症”与疫病在致病机制上的相似性，治痧方法被用于对新的疾疫的救疗。在疫病环境之下，多方参与对方药的总结，诸多古方以及效验成方进入“痧药”范畴，“痧药”的内容和范围基本确立。随着对“痧症”知识的总结和痧书的刻印，“痧症”作为一种疾病范畴的确立，常见“痧药”的范围和种类也逐渐确定下来。从医学知识到治病的药物，“痧药”的运用离不开具体的药物制备活动。“痧药”修合多用珍贵药料，修合费时费力。在疫病流行之中，由官方或社会慈善力量组织，制送“痧药”。慈善性质的施药活动客观上起到药物资源供应的作用，但并不能满足社会对药物的潜在需求，以商业化模式生产和经营药铺的出现，则使得“痧药”进入日常生活。

从慈善施药到商业化制备，“痧药”供应模式的转变体现着明清时期医疗环境和医疗资源供应模式的演变趋势。梁其姿对地方社会医疗资源的研究中指出，明代中叶后，国家组织的医药资源供应模式退居

① 《民生与家计》一书中，作者根据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从医药和巫卜两方面估算 1930 年代江南居民在医药巫卜方面总花费，每户每年大概为 7 元左右，其中医药花费大概在 3 ~ 4 元。

其次, 由社会、商业力量主导的医疗服务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在医疗领域缺位^[19,30]。以往对于明清社会慈善救济活动的考察, 揭示出由地方士绅或主要由其主导的社会力量客观上起到为社会提供医药资源的作用^[13,31], 但总体来看, 慈善救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士人重整社会道德秩序和追求个人道德威望的方式^[32], 地方社会医药资源供应并非其主要的关注点, 即使是在嘉道、同治之后, 慈善组织更趋稳定化并且出现专门提供医疗服务的医药局^[13], 以慈善力量主导的药物制备大概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边和结合医疗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 认为在国家组织下的医药资源供应模式衰落的背景下, 医药资源以商业化的模式组织起来, 为社会提供医药服务^[33]。“姚致和堂”等以商业化模式制售“痧药”的商业药铺的大量出现是清代, 尤其是 19 世纪以后医疗资源和服务商业化趋势的重要体现。

在“痧药”的例子中, 商业、市场力量不仅促使“痧药”以商业化模式生产并得以进入日常生活, 同时透过其运用似乎亦能窥见商业市场对于医药领域的影响。祝平一对痧书的研究指出, 郭志邃等以刮、挑等治疗方法见长的医家居于社会边缘, 他们不断对痧书文本进行整理, 以达到构建“痧症”理论体系、弥合其与“儒医”群体之间的隔阂的目的^[3]。在“痧症”“痧药”的例子中, 虽然郭志邃等痧医及其所使用的治疗方法为“儒医”所不齿, 但是由所谓边缘医家所生产的痧书在清代被不断刻印并得到广泛流传, 以致王士雄等医家虽然不用“痧”指称病证, 但在论治中亦吸收了有关“痧”的知识。所谓的主流和边缘医家之间的界限或许并不分明, 同时被认为其各自所代表的技艺亦统一于日常的治疗实践。在医药市场中, 医技、药物、知识等均像货物一样流通与交换^[34]。医药市场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医者和药物, 在占据延医和择药主导权的病家眼中, 或许医疗实践的“效验”才是最重要的, 被主流医家排斥的医者、治疗方式等均有其存在的空间。边缘医家、药商等共同参与形塑医疗模式、提供医疗资源的过程, 医疗市场中的医疗实践受到来自医学以外的商业等社会力量的影响, 医疗实践乃至医学知识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属性。

参考文献

- [1] 纪征瀚. 古代“痧”及治法考 [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
- [2] 皮国立. 中西医学话语与近代商业: 以《申报》上的“痧药水”为例 [J]. 学术月刊, 2013, 45(1): 149-164.
- [3] 祝平一. 清代的痧症: 一个疾病范畴的诞生 [J]. 汉学研究, 2013, 31(3): 193-228.
- [4] 纪征瀚. 清代痧症医籍系统考 [J]. 中医文献杂志, 2009, 27(4): 1-4.
- [5] 纪征瀚. 《痧症全书》及其主要传本 [J]. 中华医史杂志, 2008, 38(3): 170-175.
- [6] 郭志邃. 痧胀玉衡 [M]. 点校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 [7] 王凯. 痧症全书: 上卷 [M]. 光绪二年刻本.
- [8] 刘靖. 片刻余闲集 [M]// 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第 1137 册. 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378-381.
- [9] 单丽. 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 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7, 32(1): 146-158.
- [10] 王凯. 痧症全书: 下卷 [M]. 道光五年刊本: 1-2.
- [11] 王士雄.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M]. 陈明见,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 [12] 王妍允, 郑洪. 清代江南地区治疫成药生产与消费的初步研究 [J]. 中医药文化, 2021, 16(2): 116-123.
- [13] 余新忠. 清代江南疫病救济事业探析: 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J]. 历史研究, 2001(6): 45-56, 190.
- [14] 王逢源, 李保泰. 光绪江都县续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67.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195.
- [15]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5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327.

- [16] 俞樾. 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 [M]. 南京: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 1940:3-4.
- [17] 王同. 光绪唐棲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8.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191-192.
- [18] 卓介庚. 塘栖的名门望族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8:184.
- [19] 梁其姿. 明代社会中的医药 [M]// 面对疾病: 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87-188.
- [20] 边和. 谁主药室: 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探讨 [G]// 余新忠. 新史学: 第 9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38-70.
- [21] 郑洪. 从贡赋分派到折银改革: 兼论明代药材市场的形成与影响 [J]. 中国农史, 2020(5):73-83.
- [22] 雷桐君堂丸散全集 [M]// 牛亚华. 栖芬室藏中医典籍精选: 第二辑.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 [23] 张同泰堂丸散膏丹全录 [M]// 牛亚华. 栖芬室藏中医典籍精选: 第二辑.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 [24] 丁甘仁. 沐树德丸散集 [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226-231.
- [25] 郑翀, 张静. 清末景德镇产药剂瓷瓶探究: 以浙江湖州“慕韩斋”订烧瓷瓶为例 [J]. 收藏与投资, 2021, 12(11):21-24.
- [26] 李经纬, 梁峻, 刘学春. 中华医药卫生文物图典陶瓷卷: 第 6 辑 [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 [27] 黄敬斌. 民生与家计: 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254-260.
- [28] 方行. 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 [M]//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中国古代经济论稿.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 [29] 史志宏. 王业键《1638—1935 年间江南米价变动趋势》述要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3):149-160,89.
- [30] 梁其姿. 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 [M]// 面对疾病: 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27.
- [31]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M]. 伍跃, 杨文信, 张学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2]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33] Bian H.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152.
- [34] Harold J C.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135-154.

(本文编辑 黄晓华)